

# 美国非裔青少年的生存之道:《我死去兄弟的自传》

齐童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 沃尔特·迪安·迈尔斯是美国非裔青少年、儿童文学的重要作家。其小说《我死去兄弟的自传》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美国非裔青少年的现实生存景象。小说主角从成长道路的选择到生与死的洗礼、从成长的迷惘到走向坚定的生存信念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美国非裔青少年的生存之道。小说略显残酷的情节,体现了美国非裔青少年小说的共性,建构了青少年群体主体性。

**关键词:** 沃尔特·迪安·迈尔斯;我死去兄弟的自传;美国青少年小说;美国非裔青少年;哈莱姆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6)04-0017-04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6.04.004

## The Survival of African-American Adolescent: Autobiography of My Dead Brother

QI Tongw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310018)

**Abstract:** Walter Dean Myers is one of the key authors of African-American adolescent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realistic survival of the African-American adolescents were described with realism in his fiction Autobiography of My Dead Brother. The survival of the hero in the fiction is fully disclosed in the process from the choices and confusion in the growth to the firm belief of survival. The somewhat cruel plot shows the commonality in African-American adolescence fictions and the adolescent subjectivity is constructed.

**Key words:** Walter Dean Myers; Autobiography of My Dead Brother; American adolescent fictions; African-American adolescents; Harlem

沃尔特·迪安·迈尔斯(Walter Dean Myers, 1937—2014年)是美国非裔青少年、儿童文学的重要作家。鲁丁·西姆斯·毕晓普(Rudine Sims Bishop)在《影响与实质:当代儿童小说的非裔美国人经验》一书中,将迈尔斯列为当代美国非裔儿童文学的五位杰出作家之一。<sup>[1]</sup>长篇小说《我死去兄弟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My Dead Brother”, 2005)是迈尔斯晚年的重要作品<sup>[2]</sup>,获美国国家图书奖青少年文学奖荣誉奖(National Book Award Honor for Young People's Literature)。与迈尔斯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相一致,《我死去兄弟的自传》也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美国非裔青少年的现实生存问题。

### 一、严酷的生存环境

纽约哈莱姆社区是美国一个著名的黑人聚居区,在历史上对美国黑人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20世纪20年代,在这里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运动。哈莱姆也因此成为美国很多非裔作家、艺术家的心灵家园,成为他们熟悉而又着意表现的意象。终其一生,沃尔特·迪安·迈尔斯也魂牵梦绕着这片土地,哈莱姆也由此成为了他一生写作的关注中心。

在不同的体裁中,在不同的情节里,在不同的作

收稿日期:2016-03-14

作者简介:齐童巍(1984—),男,浙江诸暨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儿童文学研究。

家笔下,哈莱姆会呈现出自身多方面的面貌。在迈尔斯的《我死去兄弟的自传》中,哈莱姆社区则以十分严酷的“形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具体而言,对于生活于其中的非裔青少年来说,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是渗透入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高频率枪支犯罪现象。因为这样的枪支犯罪事件,常常会超出人的控制范围,直接危及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裔青少年现实生存环境的严酷性,首先就体现其所面临的死亡威胁。小说的开端,迈尔斯就为读者呈现了一次葬礼:一名青少年因为枪击案而逝去。小说叙述者——十五岁男孩杰西(Jesse),以及和他一起长大、歃血为盟的赖斯(Rise)等社区中的孩子们,都去教堂参加了这次葬礼,亲眼目睹了已经天人永隔的伙伴,亲身感受到了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

美国非裔青少年严酷生存环境第二个特征,是导致青少年死亡的枪击犯罪的发生往往是猝不及防的,发生的机会是弥漫在日常生活中的。即使在很平和的情况下,也会因为十分平常的社会情形而骤然发生枪击事件。如当杰西等几位伙伴,白天在社区街头闲逛、聊天时,就经历了一辆大巴校车在路上遭遇了挡路的出租车后大巴司机直接开枪射击的事情。伙伴本尼(Benny)的手掌被子弹击中,让杰西陷入无法言语的痛苦之中。

这样的社区治安环境的形成,正是因为枪击犯罪已经陷入了一种冤冤相报的、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参加葬礼的成人不禁感慨:“一次枪击案发生了,然后有另一次报复的枪击案,人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止。”但是,哪怕是警方,也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恶性循环进行下去。

对于这样的严酷生存环境,在深度参与社区里一个犯罪团伙的活动前,赖斯和杰西曾有一次对话。赖斯反驳了杰西对更美好生活的期待,他认为黑人对美好生活的等待就如同某天在冷风中等待火车到来的情境一样:身体的感觉越来越冷,但是等待中的火车却永远没有来。那么是否还要继续等待下去?赖斯认为,也许那种想象中的美好生活是永远等不到的,睁开双眼看到的依然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伤痛,而毒品却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处理的伤痛。严酷的社会现实似乎比杰西的话更有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甚至对他们颇为关心的社区

黑人警察悉尼(Sidney),都无法阻止赖斯越来越深地卷入到犯罪集团之间的恩怨中并最终走向死亡的原因。

## 二、成长的心灵冲突

如果说严酷的外部环境是生活于哈莱姆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都需要面对的话,那么对处于从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过渡时期的青少年而言,心灵的煎熬,更是因为对未来既抱有期许又感到迷惘这两种心灵状态的交错出现。在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状态中,生活于哈莱姆的青少年们,都充满着对变化的期待、对成年的期待。但是,因为各自对未来生活道路规划的不同,价值理想的不同,甚至是心灵需要的不同,才导致了个体的冲突、群体的冲突和代际的冲突。

首先是个体心灵冲突。这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小说中心人物杰西和赖斯的关系的变化上。幼年时期,杰西和赖斯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由于赖斯的母亲曾经是杰西的幼年看护者(babysitter),所以他们俩几乎是一起长大的。看到旧电影中有歃血成为兄弟的情节,他们俩都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因此,在杰西七岁一次摔伤时,赖斯拉破了自己的手指,完成了这个歃血的仪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杰西称赖斯为自己的“兄弟”。

出于对非裔美国人生存境遇的现实理解,赖斯想积极主动采取行动,改变目前担惊受怕的生活状况,所以加入了贩毒集团,介入了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赖斯日益深入地参与犯罪集团的活动,并开始组织针对其他犯罪集团的对抗活动,杰西感到赖斯变得越来越陌生,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也越来越远。在杰西画笔所描绘的赖斯“传记”中,赖斯的形象日渐狰狞。作为杰西与赖斯心理距离越来越远的外在表征,当杰西将自己所画的狰狞赖斯形象拿给赖斯看时,心里是惴惴不安的,相反赖斯对杰西画作态度是比较豪放的,泛泛地肯定了几句,而并没有提出指责。在赖斯的家中,杰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感觉到比在自己家里更加地安宁、舒适,相反的,将自己心里对赖斯前途的焦虑、对自己行动的迷惘,都投射在周围环境上。在这样的心态中,杰西从小就熟悉的赖斯外祖母也变得越来越遥远。她的微笑也从真切的、美丽的,变成了非常空洞的存在。读者可

以看到,杰西心底的焦虑,是无人能够分享的,赖斯不能理解,其他伙伴不能,父母也不能。

但是在这样的心灵煎熬里,杰西的心中却始终抱着一份浪漫的信念,坚持为嬗变中的赖斯描绘“传记”。因为他认为,“我告诉我自己,如果我正确地写他的自传,如果我做得足够好,或许我可以将他变回我曾经认识的样子”。正是因为杰西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创作有一种能力,能够阻止赖斯走向死亡,让赖斯变回原来的样子,所以他才将绘画作为自己心中困惑、焦虑、不安情绪的宣泄途径,作为精神的寄托。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史蒂芬斯在《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一书中认为,在写实小说中要建构一个人物并使其能了解发生在她身边的事情……可以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或是人物聚焦来描绘,但是要描绘一个动态的幻想生活,就像日常的白日梦或假装的游戏,则是写实主义中一个常见的也是更深层的策略。<sup>[3]246</sup>史蒂芬斯所说的“动态的幻想生活”,在富有浪漫文艺气息的杰西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除却迈尔斯对几位青少年主角较为表层的行动描写,对杰西心理活动细腻的、全方位的表现,拓展了作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刻画深度,也有利于较为全面地建构一个富有思想能力的美国非裔青少年形象。

第二方面是群体的心灵冲突。出于对兄弟的关心,杰西竭力想说服赖斯,不要介入到毒品犯罪中去,从而避免被卷入到枪击事件的危险,但是收效甚微。在赖斯邀请自己参加犯罪集团活动时,杰西心里是十分纠结、为难的,他不想介入到犯罪中去。杰西的父亲、社区警察悉尼也苦口婆心地劝说杰西不要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去。但是另一方面,杰西又想为挽救赖斯做出自己最后的努力,在与赖斯的相处中寻找一些改变他的可能性。还有,他们身边的伙伴们都赞同赖斯的做法,劝说杰西,让他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放心大胆地一起去参加活动。两个方向上的力量势均力敌。当他被身边的伙伴、被社会裹挟着走向成人的时候,杰西的心底里有着深刻的迷惘。

除了杰西,其他同龄人也有着各自的心灵困境、代际冲突需要去突破。比如小说还用较大的篇幅表现了从小就为教堂演奏音乐、颇有音乐天赋的C. J.想弹奏蓝调音乐,但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因为他的

母亲觉得蓝调音乐是危险的,不能给他带来稳定的职业。更甚至于,他的母亲还反对他继续演奏音乐,因为她想让C. J.为进入大学做准备,希望C. J.对会计、商业这样的专业感兴趣,或者能够成为一名牧师。而这一切的设想、安排与C. J.的心理需要是违背的,因此杰西常常和C. J.讨论这个问题。

### 三、向死而生

在亲身经历了一次次青少年枪击案之后,由于所受伤的人和他越来越亲近,杰西内心感到了越来越无力承受的痛苦。在小说一开头的葬礼上,杰西还能和C. J.说,理想中自己的死亡应该是这样的——成为世界上最年长的人,然后在睡梦中脸上带着微笑平静地死去。随后,在大巴车和出租车相遇的那次突发枪击案中,本尼的手掌被击中了。目睹朋友的惨状,杰西感到非常沮丧,想哭泣,但又觉得自己很愚蠢。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件,杰西才意识到,赖斯所说的真实人生就存在于自己的生活里。内心理想与残酷现实的反差,让杰西陷入更深的迷惘之中。和杰西的浪漫信念相比,他们生活于此的社会环境有着更为强大的推动力量。杰西的创作并未能扭转赖斯的人生轨迹。小说的最后,杰西未能阻止赖斯发动的集团之间的交火。交火事件后,也没有能够将赖斯平安送走,反而是亲眼目睹了赖斯的死去。死的时候,赖斯还在不停地向杰西叹息:“我很害怕。”在赖斯的葬礼上,杰西无法止住哭泣,仿佛随时会倒下。在这个时候,杰西心头的悲恸可以说已经抵达了痛苦的顶点。

对于当代美国青少年小说对残酷、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呈现尺度,谈凤霞认为,当代美国少年文学将少年建构成有性的、复杂的、介入政治的,力求回到少年身处的“原点”——生物性向度和社会性向度构成的坐标系,而且对之呈现得相当大胆和开阔。<sup>[4]</sup>可以说读者在《我死去兄弟的自传》中所读到的正是“大胆”“开阔”的美国非裔青少年生活的呈现。比如,杰西对女友塔尼亚(Tania)的幻想,以及大量的枪击案、死亡、葬礼、犯罪集团活动画面的表现等等,在生物性向度、社会性向度两个向度上都做了开拓。而这在美国非裔青少年文学中却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说,美国青少年小说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也就体现在这样一些在中国读者看来会具有阅

读挑战性的方面。

另外,史蒂芬斯认为族裔小说为读者建构各种各样主体地位的主要目标,在于帮助少数民族的孩子能对自我有正面的观念,也为了所有孩子的社会化和个人发展,希望抹去种族、阶级或性别优势的概念……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将书本整个置于一个特定社会族群的文化之内,代表该族群的世界经验和其自身对经验的体悟,换句话说,就是该族群自身的主体性。<sup>[3]47</sup>实际上,《我死去兄弟的自传》通过略显残酷的情节,让美国非裔青少年群体的主体性得以比较真实可感地建构起来,这对于非裔青少年读者来说,就是一个将自我投射于其中、建构自我的过程。因此小说题名中的“自传”二字,也意味着在时间跨度为一个暑假的小说叙事长度中,浓缩了一定历史时期中一个族群的青少年的生存之道。而对于其他族群的青少年读者来说,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可以体认到较为全面、丰富、真实的非裔青少年成长的体验,有助于他们形成更为包容的社会意识。所以,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建构也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那么在悲痛的顶点之后是什么?是走向更深的沉沦,还是在抵达了人生的低谷之后折返向上?迈尔斯给出的答案是一种类似于伽达默尔“向死而生”般的日常情感的升华。面对赖斯的中枪、死去,似乎已经是不可承受的死亡之痛。然而,杰西往日里所绘就的画册,伙伴们给予的劝导,都起到了积极的劝解作用。离开赖斯的葬礼,杰西默默地在心里决定,要竭尽全力去完成好赖斯无法走完的人生故事。与伽达默尔所设想的“自己却就在热情的、解

脱了常人的幻想的、实际的、确知它自己而又畏着的向死的自由之中”<sup>[5]306</sup>最极致状态相比,小说中人的生命哲学更接近于伽达默尔所说的——“日常的向死存在作为沉沦着的存在乃是在死面前的一种持续的逃遁”,“因为它把死亡改铸成日常摆到他人那里的死亡事件”,“令我们更清楚地担保‘自己’确乎还‘活着’”<sup>[5]292</sup>。通过经历死亡事件,杰西以及依然生活由此的人们,更明白了生的珍贵,获得了更坚强地生存下去的勇气。连C. J. 的母亲也开始考虑接受儿子的请求,让他能够继续弹钢琴、风琴的爱好。

从成长道路的选择到生与死的洗礼,从成长的迷惘走向坚定的生存信念,应该说在《我死去兄弟的自传》中,迈尔斯深刻地揭示了美国非裔青少年的生存之道。同时这部小说所体现出的美国非裔青少年创作的特征,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地研究迈尔斯创作、研究美国非裔青少年文学的入口。

#### [参考文献]

- [1]SIMS R. Shadow and Substance: Afro-American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ldren's Fiction[M]. Urbana: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1982.
- [2]MYERS W D. Autobiography of My Dead Brother[M]. New York: HarperTempest/Amistad, 2005.
- [3]约翰·史蒂芬斯. 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M]. 张公善, 黄惠玲, 译.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
- [4]谈凤霞. 认同危机中的挑战——论当代美国校园小说对少年主体性的建构[J]. 当代外国文学, 2013(3): 107-117.
- [5]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